

□ 主编／孙乃民
副主编／赵鸣岐
郭洪茂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中日关系史

第一卷

张声振 郭洪茂／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 编/孙乃民 副主编/赵鸣岐 郭洪茂

中日关系史

第一卷

张声振 郭洪茂/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关系史(第一~三卷)/孙乃民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7-80230-211-0

I. 中… II. 孙…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543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何秉孟

委 员 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 王 正 杨 群

编 务 周颖昕 李 敏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张海鹏

委 员 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鹞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

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序 言

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往来历史。尤其隋、唐时代，中日往来比较频繁，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并效仿中国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了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大化革新”。此后，宋、明时代，中日两国间的通商往来也比较频繁。一直到清代，除锁国时期外，两国间一直时有通商往来。

到了近代，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并奉行大陆扩张主义政策，通过侵台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这一历史阶段的中日关系，除少数民间友好往来外，两国关系充满了血腥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这是两国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的史学工作者，都有责任和义务，本着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非军事化的改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制定了体现“国民主权、放弃战争、尊重国民基本权利”三原则的和平新宪

法《日本国宪法》。特别是其新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的规定，对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在防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后，随着日本民众中许多有识之士对以往日本侵略战争的反省和批判，在日本民间出现了积极主张并推动日中友好的运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日间开展“廖一高备忘录”贸易以后，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民间人士的往来不断增多，日本民间的日中友好运动也不断高涨。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中美关系的松动和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使日本朝野受到极大震动，并导致推行反华政策的佐藤内阁倒台。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速派松村谦三率团访华，谋求改善两国关系。中日两国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往来和交流，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经贸方面，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长期保持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日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都各自发挥重要的作用。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较高，经济技术上的互补性较大；在地缘上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文化、科教、体育等方面的往来和交流越来越广泛。恢复邦交后，中日关系的走势，总的来看是积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

但是，两国关系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或障碍性的问题，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内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等。实际上，核心问题是日本如何对待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对此，作为中日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研究，用史实说话，用史实教育青少年，使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同时，为了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

能够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历史，并引导本国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史观，特别要禁止用错误的史观和言论去伤害曾被侵略战争严重伤害过的民族的感情。否则，不仅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无疑也会影响日本与亚洲其他各国关系的发展。所以，如何对待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今后能否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国内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表了许多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并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诸如张声振先生所著《中日关系史》卷一（古代），杨正光先生所著《中日关系简史》，杨孝臣先生主编《中日关系史纲》，林代昭先生所著《战后中日关系史》，冯瑞云先生所著《当代中日关系史发展要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内的中日关系史研究，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也应看到，截至目前国内出版的中日关系史论著，多为断代史或通史简体，还没有一套从古至今全面而系统论述两国关系的多卷本中日关系通史问世。因此，我们共同撰写的这部三卷本的《中日关系史》的出版，也许会对进一步促进我国今后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开始着手研究和撰写中日关系史。起初，准备分古代和近代撰写两卷。80 年代中期，张声振先生撰写的《中日关系史》卷一即古代卷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尤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该书后，给作者来信予以较高的评价，并指出了研究当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增加了当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和撰写任务。这项研究曾被列入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中日关系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一直未能出版。最近两年，我们对《中日关系史》三卷书稿进行了认真

的修改，并对卷一内容作了较多的增补。此次，这部三卷本的《中日关系史》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这部三卷本的《中日关系史》修改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海鹏先生，大连民族学院的关捷先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步平先生（现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都曾对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部《中日关系史》的撰写，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在全书内容的把握和结构、体例安排等方面，尽管作者做出了较多新的尝试和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资料和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当代中日关系重建和发展的起点。从这时起，中日关系沿着上述条约开辟的道路，与时代同步地向前发展，已达 20 余年。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迅速，世界政治格局亦因之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东亚地区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世界历史已经步入 21 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内，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不论在东亚地区或世界范围内，都将与日俱增。而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无疑将对世界和东亚地区所形成的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此形势相适应，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界亦呈现异常活跃趋势。研究探讨世界各国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发展问题，已成为这一活跃趋势中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重建后的中日关系也面向 21 世纪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前夕，江泽民主席成功地访问了日本。中国国家元首访日，在中日二千余年的关系史中，尚属首次，只此一点已足以说明访日所具有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继毛泽东时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邓小平时代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具有深刻的内涵。

首先，它表明中国决心要把一个持久和稳定的中日关系带进 21 世纪。因为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既有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也关系到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持久繁荣，同时也就成为确保亚洲以至世界和平格局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日友好睦邻关系在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中，这一重要作用，是必须予以严重注意的。现在，中日关系已经进入 21 世纪。但是，中日关系在 21 世纪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基础之上。这是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双方必须把握并遵从这一大局，排除干扰，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在 21 世纪内健康地发展。

其次，它说明来之不易的战后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与发展，是中日两国人民不懈努力取得的；这种不懈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严酷形势下，毛泽东以其伟人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洞察了侵略战争对中日友好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会影响一代人；为了制止侵略战争，为了消除侵略战争的消极影响，毛主席及时地采取一系列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辩证地历史地提出区分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创见。^① 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这一政治创见，逐渐形成包括日本人民（也包括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并且预言，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改造中日两国”^②。这一政治创见和伟大的预言，在今天俱已实现，为中日邦交的恢复，做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后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之际，毛泽东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 34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47、503 页。

席和周恩来总理又以他们所独具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提出“民间外交”的策略，从而绕过许多政治暗礁，在两国民间人士的交往中，沟通双方思想，两国政治家终于达成共识，实现了恢复中日邦交的历史性成就。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已经随着世界历史的脚步，进入21世纪。江泽民主席在谈到中日关系在新世纪中的发展时，特别强调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紧培养有志献身于中日友好的新一代，以使两国的友好事业得以继承和发展”^①。

为使献身于中日友好事业的青年队伍茁壮成长，就必须“用正确的历史观”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正视历史并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到现在的中日友好关系，是建立在继承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传统并正确对待过去那段不幸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正确对待历史并不是算旧账，而是要从中吸取教训，才能指导中日关系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我党一贯遵循的原则，也是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我院领导正是基于江主席提出的“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青年”^②，以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克服出版方面各种困难，积极组织10年前完稿的《中日关系史》（其中卷一已出版）一书的出版事宜，以不负党和国家对史学工作者的属望。

本书初稿原拟为二卷，未涉及第二次大战后的中日关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见到卷一后曾来信鼓励，并指出中日关系不仅要研究古代史，重要的是研究当代史，因之本书又增战后卷（卷三）。但因各种客观原因，二、三卷一直未能付

① 江泽民在日中友好七团体欢迎招待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江泽民会见日本政党领导人时的讲话，199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梓。时至今日，10年前的手稿随时间的推移，已有所改变与改写。故此，当本书三卷全部付梓之时，著者已不再主编卷二卷三。

《中日关系史》卷一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严格鉴别，曾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基金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些奖励既是对著者多年从事科研劳动的鼓励与肯定，同时也是对当时史学界科研状况的反映。著者深知，只有在党和史学界的雨露阳光的滋养下，始能做出这一绵薄的贡献。另一方面，自卷一问世以来，随着科研的不断前进，过去研究不力之处和某些缺点，逐渐得到认识，从而成为著者今后努力研究的动力与方向。只是卷一早已付梓，时代遗留的痕迹，已不能消除。故此在卷一重新付梓时，著者不拟作较大的改动，只对部分章节作了增删。更完善的科研成果，将随时间的前进不断地涌现，冀求一部著作能够永远与时代同步，虽是过苛要求，但却是催促著者不断前进的动力。

关于编纂《中日关系史》的目的和结构，在第一版“前言”中说：“在历史上，中日两国存在着近两千年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战争、文化教育、技术交流等各方面的关系史。史学界先辈和同仁，对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史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撰写了很多学术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但是，迄今为止，尚无将上述各方面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叙述的专著。中日两国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存在的关系，不是孤立发生的，是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条件下发生的。著者有鉴于此，在共同讨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将中日两国上述各方面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撰写成《中日关系史》一书。著者企图从存在于中日两国的整体关系中，揭示出每一个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以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由于著者对本书的体系尚处于研究

阶段，对每一时期和每一事件的规律性认识得很肤浅，因此，本书肯定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著者希望在史学界先辈和同仁的帮助指导下，进行修改和提高。”

“第一卷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止于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叙述自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日两国间存在的各方面的关系，尽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两国的友好关系史中，双方互有借鉴、互有促进。但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两国间在上述各方面存在的友好交流关系，尽管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断，仍在向前发展，但就其主流说，却发生了全面逆转。两国关系中的主导方面，是日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侵略关系，并且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加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特别是向日本人学习拯救中国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本书再版时由张声振、郭洪茂执笔，进行修改，尽可能地吸收、利用当前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史料，对本书的结构略作增删。各章增加了部分节、目。例如：第一章增加第二节秦始皇时代中日间的交通状况，第四节第二目增加对“景初二年”问题的探讨；第二章增加第七节渤海与日本的交聘；第四章增加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等。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日本学术界讲授中日关系史的教授水野明博士，特邀著者撰写《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一书（已出版），作为他讲授现代中日关系史课的主要参考书，令学生了解

中国学者的史观。这是中日学者学术交流中出现的一种新事物，意义深远。

附带说明，本书引用书目如《二十五史》、《通典》、《通鉴》等未注明著者和版本，其余书目只在第一次引用时，注明著者、版本、年代等，不周之处尚望察谅。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及其发展	1
第一节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建立的开端	2
一 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载中日间的古代交往	3
二 汉族劳动者移居日本及其传说	6
第二节 秦始皇时代中日两国间的交通状况	11
一 中国的海上航路	12
二 日本的海上交通	16
三 从航路探讨徐福所得平原广泽的地点	20
第三节 汉帝国和日本群岛上早期倭人国家间的 友好关系	24
一 汉代的两条国际通道	24
二 东汉与倭奴国建交	27
三 东汉与伊都国建交	30
第四节 魏与邪马台国建立册封交聘关系	34
一 带方郡与邪马台国	34
二 邪马台国使节赴魏都的时间	37
三 魏和邪马台女王王国间册封关系的建立	51
四 《三国志·倭人传》中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	58